

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成果

基础 教育 教材 建 设 丛 书

教材多样化 的探索和研究

《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丛书》编委会 编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成果
基础 教育 教材 建设 丛书

教材多样化 的探索和研究

《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丛书》编委会 编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材多样化的探索和研究/《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丛书》编委会编.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丛书)

ISBN 7-107-17489-4

I. 教…

II. 基…

III. 中小学—教材改革—研究—中国

IV. G63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4638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沙滩后街 55 号 邮编:100009)

网址:<http://www.pep.com.cn>

益利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 毫米×1 240 毫米 1/32 印张:4

字数:97 千字 印数:0 001~1 000 册

定价:10.10 元

前 言

进入 21 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使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着更伟大更艰巨的任务。今后 5~10 年是我国经济和教育文化发展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一形势迫切要求基础教育加快推进素质教育的步伐。努力培养具有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

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作为学校教育的核心环节，集中体现了国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是学校教师开展教学和组织学生活动的最主要的依据，制约着学校教育的活动方式，影响着学生身心发展。综观中外教育改革，无不把课程教材改革放到突出位置。特别是近年来，世界许多国家，无论是反思本国教育的弊病，还是对教育提出新的目标和要求，都是从课程教材改革入手，通过课程教材的改革，来调整人才培养目标，改变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些国家都把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作为增强国力，积聚未来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措施加以推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也先后进行过七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每次课程改革都解决了当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取得了明显成就，推进了我国教育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了辉煌成就，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全

国中小学统一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出版的教材，到 90 年代选用经过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的六套规划教材、百余种单科教材共三千余种，这中间无一不倾注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小学教材的关心，倾注着教材编写者、审查者的心血。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原有的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已不能完全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教育部决定大力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调整和改革基础教育的课程教材体系、内容，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体系。

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体系，最根本的是在教材建设中引入竞争体制。为此，从 2000 年初开始，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关心下，由国务院体改办牵头，教育部、国家计委、新闻出版署共同参与，以降低教材价格为切入点，对中小学教材管理体制，即教材的编审体制、出版体制、发行体制、价格体制，进行调研。在调研的基础上，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体改办等部门联合下发的《降低中小学教材价格深化中小学教材管理体制改革的文件及其配套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办法》《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办法》等 11 个文件，对教材的编写、审定、出版、发行，选用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确定了中小学教材建设实行在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方针，教材编写实行国家立项核准和审定；教材价格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以租型、出版、发行等环节发生的行业平均成本和 5% 的成本利润为基础，实行国家核定制；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要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等一系列政策法规。明确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单位、团体和个人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高质量、有特色的教材。特别鼓励编写适合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使用的教材。

这些文件的出台，为进一步深化中小学教材改革注入活力，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中小学教材建设的关注和参与，带来了教材编写的空前繁荣。众多的大学、科研机构开始关注中小学教材的建设。众多的大学教授、科研人员开始参与到教材的编写中来；国家新课程标准教材的编写申请立项从 2001 年开始到现在，仅仅 2 年多的时间，教育部就受理义务教育阶段国家课程教材编写立项申请项目 500 余项，受理高中国家课程教材编写立项申请项目 187 项，有近百家出版社参与到教材的编写立项工作中来。

教育部在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过程中成立了“中小学教材发展机制研究课题组”（该课题组现更名为“教材选用与课程资源开发研究”课题组），力图通过研究总结我国建国以来基础教育教材建设的成果，了解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础教育教材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把握世界教材改革的趋势，探索我国教材建设的理论和管理政策。参与该课题研究的人员有大学研究人员，有基础教育教材研究、编写部门的人员，还有各级基础教育教材管理部门的人员。课题组从成立到现在虽然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全课题组的同志精诚合作，在教材编写、审定、出版、发行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力求课题研究的适应性和针对性，在关注基础教育教材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含量的同时，紧密结合教材建设和管理过程中的实践活动。为教材管理政策的出台提供咨询和服务，使得出台的教材管理政策具有一定超前性和较好的可操作性。

课题组研究总结我国建国以来基础教育教材建设的成果时，对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教材多样化方针实施初期，参与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的人教版教材、沿海版教材、北师大版教材以及上海教材的编写出版过程进行了研究，他们召开了多次

研讨会，听取编写出版人员和使用这些版本教材的教师校长的意见。在研究过程中，了解到建国以后组建的国家级教材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教材多样化实施过程中，面对市场的挑战，由前期的困惑、不理解，到后期的积极参与竞争的转型过程；上海市教委成立课程教材改革委员会，独立研制上海课程方案和标准，组织编写与之相适应的教材的经验和体会；师范大学参与组织编写教材的实践体会和经验启示。这些体会和经验对参与新课程标准教材编写和出版的单位都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教材多样化的探索和研究》就是在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一本论文集。我们期望在更多的有志于参与教材建设的单位投入到新课程教材的编写、出版过程中。这本论文集可以帮助借鉴他人经验，提高自己教材编写的水平和质量，提升自身的竞争能力。

愿我国基础教育教材在改革中越编越好。

编 者

2004 年 2 月

目 录

前 言 \ \ 1

人民教育出版社五十余年中小学教材编写出版工作研究 //

1

一、人教版教科书的沿革 \ 2

二、对中小学教科书和教学理论的研究 \ 22

三、市场和新观念面前的人教版教材 \ 27

四、认识与思考 \ 50

上海中小学教材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 //

56

一、中小学教材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 56

二、上海中小学教材管理体制的改革 \ 57

三、规范上海中小学教材管理体制的基本流程 \ 66

四、问题与建议 \ 75

沿海版义务教育教材建设的创新与特色 //

78

一、教材创新是一个整体构建的过程 \ 78

二、教材创新的核心是转变教学观念 \ 82

三、教材创新要求建立新的管理体制 \ 85

教材发展机制改革：沿海版教材的实践与经验 //

89

- 一、教材发展机制改革的问题与对策 \ 90
- 二、沿海版教材发展机制的特点 \ 94
- 三、沿海版教材发展机制改革的基本经验 \ 98
- 四、对今后教材发展机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 100

义务教育“五四”学制、课程、教材研究与实践 //

103

- 一、学制、课程改革研究与实践 \ 103
- 二、“五四”学制教材建设与实验 \ 108



人民教育出版社五十余年 中小学教材编写出版工作研究

邢克斌 张廷凯

人民教育出版社——我国最大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和出版单位，从1950年成立起，至今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

五十多年来，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上级单位教育部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共出版各类教材及教育图书近两万种，累计印数达数百亿册，为我国中小学教材和其他各级各类教材的研究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历史上看，人民教育出版社从成立到壮大再到“文革”后的恢复，都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教育部的关怀和支持。正是在这种关怀和支持下，人教社集中了大批人才，其学术、科研力量十分雄厚。同时又因为有国家的“统编”政策，人教版中小学教材曾一度几乎覆盖全国，成为中小学教材编写和出版事业首屈一指的出版社。几十年下来，人教社形成了自己的工作方式，自己的经营方式和运做系统，在我国乃至世界都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只要一提起中小学教材，人们就会想到人教社。

自从1986年教育部提出教材多样化的政策之后，一些大学、地方出版社逐渐介入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工作，人教社编写出版教材的“大哥大”地位受到诸方面的挑战。随着课改的深入，有更多的出版社参与到教材的编写出版中来。在这

种形势下，有必要对人教社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一番研究，看看人教社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我国的——教材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人教社的工作模式是如何形成以及对我国教育事业到底有什么贡献，在市场面前人教社是如何应对的。这样，对我国基础教育教材建设政策的研究与确定，对我国中小学教材的发展，是有一定意义的。

一、人教版教科书的沿革

（一）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初期教科书的生产情况

1.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临着十分庞杂的任务，不仅在政治上要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还要在战争残留的废墟上抓紧经济建设，同时在文化上亟需对国民尤其是青少年进行人民民主专政下的新型教育。1949年9月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指出：“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

抓紧教育工作，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编写一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反映中国共产党意旨的，“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的全新教科书。

当时，教科书的使用十分混乱，主要有两大类，多种版本：

第一大类，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教科书。有些教材由前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编，国立编译馆校订；有些





署“国立编译馆主编”，“教育部审订”，由当时的文化名人如叶楚傖、金兆梓等主持；还有些由私人编写，但书中说明“遵照教育部××学科课程标准编辑”；另有些则完全由私人编辑、私人发行。教科书出版单位，仅上海就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正中书局等十几家。在南京、北平等大城市，也有一些书局出版教科书。这些教科书，水平参差，尤其是一些封建的、反动的观点、立场，基本是符合国民党政府的意图的，根本不能适合新中国的儿童少年使用。改变这种状况，使教科书适合新中国的国情需要，向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科学、民主、进步的教育，树立和发展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已成当务之急。

第二大类，是中国共产党开辟的各解放区的教科书。如陕甘宁、晋绥、晋冀鲁豫、东北、华北、山东等解放区，都由当地人民政府组织编写、并由当地新华书店印制和出版了各科教材。学科、年级还算比较齐全。但时处战争年代，受制于军事、地域等因素，只能供临时使用，虽在个别解放区有辛安亭、荣孟源等名家参与，大部分教科书仍因时间紧迫，仓促编就，编写水平并不很高，书的内容、观点、知识量、编写体例等，各地也不统一。

在全国大陆除西南少数地区基本得到解放的时候，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及时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上来。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召开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会上提出中小学教材必须实行全国统一供应的方针，并决定由教育部和出版总署共同组建承担编写和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专业出版社。10月26日，教育部、出版总署共同向中央报告，由二单位“共同负责成立一个专门出版教科用书及一般教育用书的出版社”，“在方针政策上受教育部领导，在出版业务上受出版总署领导”。同年12月1日，在解放初期百

废待兴的时候，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中央的关怀下，应运而生了。毛泽东主席亲自为人教社题写了社名。就当时的形势讲，人教社的诞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这在新中国教科书编写和出版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形成了人教社集研究、编写、出版、发行为一体的、完全区别于其他出版社的独一无二的运做方式。

2. 人民教育出版社地位的确立和运做模式的形成

中央人民政府对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成立十分重视，任命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兼任人教社的社长、总编辑，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柳湜兼任副社长、副总编辑，社务会议成员由朱智贤、金灿然等教育界、出版界卓有成就的名家担任，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仅仅过了 25 天，教育部、出版总署联合发布《关于 1951 年春季教科书的售价及生产供应办法的决定》，要求人教社担任 1951 年春季华北、华东地区中小学教科书生产造货工作，并向其他地区统一供应纸型，由当地新华书店分区造货。决定还要求：各地应把销售情况及时向人教社报告，人教社要在研究的基础上做到全国教科书定价划一。此时的人教社，实际起着教育部全国教科书中心的作用。这年春季教材（因时间过紧，主要以改编为主）共计 35 种、93 册，由人教社供应的有 30 种、85 册。人教社教材当时被称为“中央版”。在随后由政务院批准施行的《一九五一年出版工作计划大纲》中，明确要求“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重编中小学课本，并于本年内建立全国中小学课本由国家统一供应的基础”，“改善中小学课本的发行工作，使全国学生普遍地及时地获得所需要的课本。”^① 按照这个要求，人民教育出版社立即着手对现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三辑，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6 年 7 月版，第 6—7 页。





有教材改编或修订，以尽快实现中小学教科书由国家统一供应的目标。

1951年春，经出版总署核准，人民教育出版社与新华书店总店联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教科书出版会议，会上总结并研讨了以下问题：当年春季的教科书供应工作，秋季教科书的全国生产计划，布置并调整造货据点，人教社委托地方造货并确定与地方人民出版社的关系等。这次会议的内容，被叶圣陶社长概括为“调整生产”“准时出版”“及时供应”十二个字。会后不久，教育部和出版总署联合发布《关于1951年秋季教科书用书的决定》，规定了这年秋季教科书目录：共57种、108册。其中50种共98册由人教社供应，这是人教社改编并供应的第一套全国统编教材。

此后，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行使自己的职责。1952年7月，经教育部、出版总署同意并上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人民教育出版社牵头召开第二届全国教科书出版会议。会上，已调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局副局长的金灿然，代表出版总署在报告中明确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与地方出版社关于中小学教科书在供应工作上的关系：

人教社方面：

第一，根据教育部、出版总署的指示，制定全国教科书造货计划和各地区供应的范围；

第二，根据教育部、出版总署指示之方针，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并排制纸型，在部、署领导下负责通知每学期教科书版本和定价、排制情况，并与发行系统签定合同；

第三，提供纸型供给办法，按合理需要供给纸型、铜锌版及样书。

地方人民出版社方面：

第一，根据人民教育出版社提出的造货计划和负责范围如

期完成任务；

第二，印造教科书应保证版本、定价与人民教育出版社一致，达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标准；

第三，地方提供所需制版数字，与人民教育出版社订立租型合同，按合同缴租型费^①。

这次会议以后，人民教育出版社教科书的供应方式基本确定，由那时直到现在，在 50 多年的时间里，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小学教材的主要供应方式就是租型造货。供型品种从几十种、不足一百册，发展到几百种、近两千册；供型材质由供铅印用的纸型、铜锌版，到今天的供胶印用的胶片和电子文件；定价从单一的统一定价到参考定价再到定价完全放开由地方自主；租型单位也由单一的地方人民出版社转到省出版局、人民出版社、教育出版社、出版公司等多种类型。但无论有多少变化，这种供型、租型的格局和固有的征订、发行渠道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运做。实践说明，这种运做方式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相对贫困、地形条件极为复杂而交通条件并不十分顺畅的国家来说，在有限的时间内确保印制生产、运输发行、及时供应方面是十分有效的和合理的。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小学教科书供应方法，是中央与地方，教科书编写和出版单位与出版、发行部门的成功配合。

3. 人民教育出版社规模的奠定

1953 年，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教育问题，毛泽东主席主持了会议。毛主席认为，当时人教社只有三十几个编辑太少，增加到 300 个也不多；他指示：教育部宁可把别的摊子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四辑，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年 3 月版，第 132—133 页。





缩小，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社会主义教材。毛主席还指出：所谓教学改革，就是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因此，应该改编教材，编辑教学法^①。会议决定：从全国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成立语文和历史两个教学问题委员会，研究语文和历史教学问题和教材编写的方针原则。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中共中央组织部从全国调来一批教育干部、教师和专家，充实到人教社，由已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叶圣陶继续兼任社长、总编辑，由从上海文化教育委员会调来的长期从事教育领导工作的戴伯韬担任第一副社长、副总编辑。

此后不久，政务院发出《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遵照这一指示，人民教育出版社着手准备编写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并制定了这套新教材的编写方针：第一，贯彻社会主义思想，采用系统的基本科学知识，注意吸取先进的科学成果。第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释各种问题，即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阐明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规律。第三，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把科学原理、法则、定律与我国工农业建设、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第四，符合教学原则，适合各科教学目的与学生年龄特征。第五，吸取苏联先进经验。教育部于7月批准了这一方针，并指示：“目前编订的教学大纲、教科书和教学法，是我们中小学校和师范学校改革的一项基本措施，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干部必须充分认识这一任务的重大意义，努力争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这套教材，小学按照“四二”制分段，中学阶段则按照初中、高中各三年安排课时。1956年，这套教材编写完毕，于当年秋季向全国供应。这是人教社也是新中国第二

^① 《中国教育年鉴 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82 页。

套统编教材。在编写过程中，人教社聘请了几十位德高望重的专家、学术权威作为各科教科书的顾问，还请一大批专家、教授审读了教科书稿，在质量方面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在此后各套教材的编写工作中，人教社一直坚持请大批专家担任顾问。

（二）统编教材的几次分合

1. 我国教科书的第一次地方化

1958年，毛泽东主席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同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党中央正式发动了“大跃进”。《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要求“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①，“一定能够高速度地进行建设，一定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②有的同志也提出：“我们要求的建设速度是成倍地、几倍地、以至几十倍地超过过去的中国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③对于长期受到三座大山压迫的贫穷落后的中国来讲，这反映了当时一些领导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尽快改变经济文化落后面貌、奋力追赶世界先进国家的迫切愿望，然而在实际上，却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忽视了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此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大跃进”的观念，也反映到教育战线。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进行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积极地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号召。

一些省积极响应，纷纷提出“一年内变成文化省”，“年内

① 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力争高速度》。

② 1958年5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

③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页。